◆观 点

终结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全国将首次针对土地出让金展开大范围审计。据估计，在过去13年中，土地出让年收入增长超30倍，总额累计近20万亿元。

数额巨大、首次审计，是刺激公众神经的两大看点，且是在反腐败斗争轰轰烈烈的背景下。高达20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成了“糊涂账”，其中到底隐藏了多少尚未发现的腐败，要等到审计结果公布才好下结论。但是查处腐败，显然不是这次审计的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审计的目的，是要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设定的改革内容“转变政府职能”之财税体制改革做基础性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土地出让金数额越来越大，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地方财政的土地财政特点越来越明显。其所以如此，固然在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但是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中的缺陷，也为土地财政打开了方便之门；而GDP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则是地方政府及其主政者热衷于土地财政的内在动因。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至少带来三大危险。

第一，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征收引发社会矛盾，征地冲突中死人伤人的事件不时发生。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中本应扮演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是在很多见诸报端的征地冲突中，它都成了利益一方，而土地所有者尤其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民，其征地所得往往低于出让金额很多，个别案例中甚至低到只有土地出让金的二三十分之一，这一所得比例反衬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严重程度。

第二，财政安全隐患。对土地财政的过分倚重，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安全隐患。根据财政部数据，2013年全年地方本级收入为68969.13亿元，而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1249.52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本级）的比例高达59.8%。姑且把“土地出让金”视为一种税收，试问有哪一个行业所缴纳的税收能够占去全部地方税收的60%？

第三，与民争利。如此高比例的土地出让金，对某些地方的政府来说，像染上毒瘾一般难以解脱，一有增加，便喜形于色，一有减少，便惶恐不安。也因此，地方政府被公众指认为是高房价的第一推手、与民争利的热衷者。

这种公司化倾向必须治疗，其前提是必须清楚它的基本情况：规模有多大？目前的使用状况如何？明了这些基本情况，才能根本厘清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设计可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措施，以及人大如何在土地出让金的监管和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使土地出让金不再成为地方主政者追逐的猎物。在此基础上，政绩考核办法的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方政府去公司化才有可能。（2014年8月29日《东方早报》任大刚）

农村土地确权应当慎行

农村土地确权，按中央文件的说法，是要确各类土地权利。我们不妨以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为重点，对农村土地确权进行讨论。现在重新确权，其意义或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丈量清楚每块土地的面积；二是赋予农民较过去更大的土地承包权利；三是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否则，这样的确权就是无事找事，没有意义。

先从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来看，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是30年，现在30年不到就延长，更重要的是，就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来讲，农民承包的土地，无论是面积、地块、四至，都是很清楚的，明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湖北省有关部门希望借这次中央土地确权在土地承包面积严重不均的村社搞一次土地均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有可取之处。不过，如果承包期到2028年，现在调整，只会进一步降低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意识，这与本次土地确权的初衷背道而驰。

再来看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讲，更大的土地权利没有意义，因为在已经取消农业税费情况下，农民可以自主经营，所有农业收入都归自己，更大的土地权利并不能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对于土地可能被征收农村来讲，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将造成地方政府征地的巨大麻烦，这种麻烦并非仅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抗，而且更是村社内部为征地补偿如何分享而形成互相对立互不妥协的两派，造成补偿无法分配，征地无法进行。

最后来看丈量承包土地面积。现在确权就是要将每户的土地面积丈量清楚。但对于农民来讲，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土地产出，而土地产出不仅与面积有关，而且与土地肥沃程度、灌溉方便程度、光照条件等有关。对国家来讲，土地二调数据早就清清楚楚，也没有必要再丈量到户了。至于承包地权的四至，在村社熟人社会从来就不存在不清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前正在全国进行的，预算达上千亿元之巨的土地确权，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即使要做，可以等到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再来做。我们何苦在确权上如此急不可耐呢？

当前正是农村人地分离、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村耕者不断变换的时期，在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很少，承包土地地块分散的情况下，在当前承包土地的农户与耕种土地的农户越来越发生分离的情况下，承包土地农户对具体地块的土地权利越大，耕种土地农户要整合细碎地块以便于耕作的难度就越大，土地就越是无法被有效耕种。这在当前农村已是普遍情况。确权进一步强化承包户对具体地块的占有权，就只能使细碎土地整合为宜耕地块的难度更大，土地就越是无法有效耕种。这本来应是所有了解农村情况人的常识，在理论上被称作“反公地悲剧”，但当前政策部门似乎对此毫无所知，是为一叹。（2014年第7期《决策》贺雪峰）

◆纵 横

期待更加优雅的外交表达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逐步提高，涉外部门新闻发言人成了出镜率很高的“明星级”人物。他们借助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媒体访谈等平台，传达政府声音、阐释国家政策、维护民族利益、塑造国民形象，在引导舆论走向、影响受众立场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效和有益的建设性工作。

但我们仍然要说，一些新闻发言人的“外交辞令”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距离理想、完美的境界还有一些距离。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们的语言有些时候还不够纯粹，在传递政府观点、表达国家意志的时候，会掺杂一些训诫式词汇和情绪化语言。这样的语言虽然也有宣示立场、震慑对方的积极效果，但损害自身形象、降低自身高度的负效应也不能忽视。

能够成为国家涉外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他们大都阅历丰富、智慧超群、口才出众。但智慧和口才并不是一名优秀新闻发言人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比智慧和口才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人、谦虚优雅的人文修养，是开阔明朗的胸襟气度，用这样的修养和胸襟去统摄“自己”的智慧口才，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文革”思维还存在，大批判、大字报的遗风还存在，稍不注意就会主宰我们的语言逻辑和风格，肝火旺盛、躁热不退，不习惯也不善于好好说话。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语言环境中，要求发言人特立独行、超然免俗，的确也难。

但时势要求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必须超越传统、超越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形象和个人风格事关国家形象，发言人的形象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设计、如何塑造，很有必要做深入论证。从语言这个角度看，无疑应该力戒直接、粗暴的风格，让优雅、得体、温和的语言成为外交辞令的主基调、主旋律。一个文明的国家，其语言首先要文明。它既是自尊自信的，也是优雅谦虚的；既是直接明朗的，也是智慧含蓄的；既是绵里藏针的，也是刚中有柔的。态度强硬并不意味着语言强悍，旗帜鲜明也不意味着口水飞溅。有理不在声高，对于一种政策信息而言，温和的表达、优雅的传递，无疑更容易被认同、接受。语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好的政策加上好的“解释”，宣传的效果才能实现最大化。

我们正处在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我们与相关国家打交道时遭遇的种种困扰和矛盾，都与这种大而不强的现实有关。身板伟岸、体量很大却内功不强、内涵不足，这一现实很容易让我们在自卑与自负之间、软弱与强悍之间摇摆不定、进退失据。所以，新闻发言人面临的问题，既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正像我们由大国向强国的迈进征程充满曲折一样，新闻发言人王者风范的打造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期待他们有更好表现的同时，也给他们多留一些时间吧。（2014年8月12日《环球时报》齐忠亮）

◆史海钩沉

1983年，奉命写文章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8·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但邓小平“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小平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点，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小平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小平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温故是为了知新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小平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2014年8月15日《南方周末》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评 论

共寻价值和信仰的符号

从国民情感到国家责任，我们追寻的是一个个烈士，也是触摸国家的沧桑历史；通过纪念烈士，国民牢牢凝聚一起，民族更具凝聚力。一个不忘记先烈的民族，一个敢于表达真实情感的国家，必然更能赢得尊重，也更有前途和希望。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8月31日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多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设立烈士纪念日，如今终于成真。9月30日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次日便是国庆。将9月30日定为烈士纪念日，立意显然不简单，没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也谈不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为国捐躯，我们怎可遗忘？他们抱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壮志抗击外侮，我们怎能不满怀敬意纪念他们？

设立烈士纪念日，表达的是国家立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专门设立向烈士纪念的节日，尽管名称不一，但内核一致。比如，美国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无论现役军人还是老战士都向阵亡将士致意，吹响军中熄灯号让死难将士安息；英国将11月11日定为荣军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伦敦白厅的和平纪念碑都会举办国家纪念仪式。对烈士的态度，最能检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从国民情感到国家责任，我们追寻的是一个个烈士，也是触摸国家的沧桑历史；通过纪念烈士，国民牢牢凝聚一起，民族更具凝聚力。一个不忘记先烈的民族，一个敢于表达真实情感的国家，必然更有希望，也更能赢得尊重。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这既说明国家纪念日正在形成一整套体系，也说明纪念日的法定化明确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无论9月3日、9月30日还是12月13日，对先烈的纪念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重要性不同寻常，意义也不同寻常。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共同灾难，不是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我们纪念烈士，不是记住仇恨，也不是单纯地表达情感，而更是传递我们的价值观，表明我们尊重生命，警示后人。犹记得，今年3月28日，在异国他乡长眠60余年的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由专机从韩国仁川机场运抵沈阳桃仙机场，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接收牺牲在韩国境内的志愿军遗骸。这一刻，让人泪流满面；这一刻，更让人读懂了国家存在的含义，国家情怀所本该具有的价值温度。

通过纪念烈士，应该唤醒我们对生命的更加珍视，对和平的更加呵护。今天，烈士的内涵正在宽泛，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人是烈士，在抢险救灾或者其他为了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民生命财产牺牲的人也是烈士，所有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公共利益献身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感念。

也不应回避，一些地方的烈士陵园荒废，烈士的英名事迹被淡忘。英雄不一定是烈士，烈士一定是英雄。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他们，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他们，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他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建造一个可爱的中国，“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他们，在和平年代毅然为了公众利益流血，“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记住烈士，是我们的良知所在，也是共同的责任。

一个月之后，就到了9月30日，这是首个烈士纪念日。期待到那一天，我们将情感融入纪念活动，将责任上升到对中国梦、民族魂的追寻上，让纪念烈士，成为全民共同追寻价值和信仰的一个符号。（2014年9月1日《北京青年报》特评）

◆文 坛

民族性格正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开放，极而言之，是向西方开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东半球为中心的。那种以节奏强劲、热烈狂放而著称的迪斯科，在中国似乎以“跳”还不能尽兴，干脆用“蹦”来命名。如此“以蹦代跳”来表达迪斯科的狂热躁动，大约在世界上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处。要说这是在美国自不稀罕，但这是在中国，在几千年崇尚温让恭谦，拘谨守成的民族，暴发如此火热的生活激情，真是不可思议。

要说蹦迪是以年轻人为主角，不甘寂寞的老年人则在街头摆开了秧歌阵，严格来说，这是迪斯科化了的秧歌舞，或是秧歌化了的迪斯科。抒发怀旧的老人也有尽情之处，双休日的景山公园常常有上百人自发集聚，大唱上世纪50年代的歌曲，焕发往日的青春。中年人大都钟情“国标”，每在清晨或傍晚，凡是公共场地，就不乏就地起舞的景象。

要说能歌善舞的，习惯性地是指少数民族，而在中华民族中占了绝大多数的汉族，从宋明以来罕有自娱性的舞蹈。这并非是汉族缺乏跳舞的豪兴，在先秦和汉唐都有即兴起舞的时尚，后来这种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对此，宋明理学起了重要作用。儒学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违背了人性发展的自然欲望，压抑了人们身心。舞蹈本是表现自我的情感艺术，却为理学所不容，成为抑制和专政的对象。舞蹈作品逐渐被戏曲吸收，失去独立发展的地位。从此人们远离了舞蹈，除了节庆例会、迎神赛会间有自娱自乐外，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已与舞蹈无缘。如今却在受儒教禁锢最深的汉族民众中，暴发出这样如醉如痴的舞蹈热情。这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表现，也只有在个性张扬的时代，才能有这样旺盛的生活激情和充沛的精力。纵观历史，只有在集体舞兴盛发达的唐代才能比拟。

如果说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时有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前进与倒退的种种纠葛和冲突，远不能摆脱转轨中的阵痛，但是市场经济的导向，却一马当先冲破了束缚人性的桎梏，释放了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生活激情，这是史无前例的景观。难能可贵的是，从自娱自乐的歌舞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早把昔日什么中国人是萎缩性、压抑性人格等说法抛诸脑后。热烈奔放的街头一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性格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4年9月1日《北京日报》刘志琴）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